

特稿

全球化的时代逻辑与中国

裘援平

进入21世纪以来,世界经历了“9·11”事件、国际金融危机、气候变化、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的全球性安全危机事件,这些事件犹如潮水般一浪接着一浪、一个盖过一个,不断挑战着国际社会应对共同危机的意愿,考验着人类是否有能力抵御这些挑战。特别是造成百年一遇公共卫生危机的新冠疫情,对全球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更是史无前例,再发达的国家在它面前也表现得十分脆弱。

纵观世界历史,科技与经济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,战争与重大危机改变国际政治进程。这一个个重大危机事件及其带来的深刻变化,都在反复地提示我们,世界不仅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而且早已步入了全球化时代,需要关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背后的时代变迁。

时代问题,既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,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现实问题。理论问题尚且不谈,仅从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,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,以及构成特定时代且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主要标志,是我们顺应历史发展、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。对时代的认定和表述,人们可以有不同标准和不同维度。在冷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,要关注世界范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的阶段性变化,用综合性标准揭示具有全局性影响和决定性意义的时代特征,把握时代变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。人类社会发展是大的历史时期与阶段性演变的统一进程,不能停留在可能延续百年乃至永恒的大时代主题概念上。面对如此宏大的话题,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各有各的叙事,本文仅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,探讨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,以及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应有的时代逻辑。

任何时代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着生存与发展展开的。全球化时代区别于其他

裘援平 全国政协常委、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。

时代的核心内容,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,以全人类的和平共存和共同发展为主题展开的。如果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地理世界延展至全球的划时代事件,那么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高度信息化的发展,已经将今天的世界改造成紧密关联、难以分割的统一体。和平共存的内在要求,是在相互依存的国家之间,只能用和平与合作而非武力与对抗的方式,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分歧,携手应对共同性问题和挑战;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,是利益交融的国际社会需要寻求利益分享和共同繁荣,促进世界整体性发展,而非零和博弈、恶性竞争。全球化时代作为一个新的时代,其基本特征有的还在持续演变,有的处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之中,以“化”的形式呈现演进趋势,但不能因此忽略其核心内容和基本走向。时代的变化有其历史规律,必然要求人们的思维导向和战略策略做出相应调整,甚至是革命性转变,否则难以适应、驾驭和影响新的时代。对世界是如此,对中国也是如此。

目前看,全球化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演进方向有以下六个方面。

第一,经济层面。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范围达到相当程度,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。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动力,而经济全球化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演变的核心动力源。数百年来,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三次浪潮。以蒸汽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,推动农耕文明转化为工业文明。以电力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,推动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。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,将大多数国家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,形成各类要素自由流动的世界统一大市场,形成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、资金链、物流链大循环,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、贸易和金融体系,世界经济从国际化、区域化向全球化发展。现在世界又迎来以数字化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,网络通讯、数字技术、云经济、无接触服务等逆势上扬,5G、人工智能、基因工程、量子科学等科技创新,各种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不断出现,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加快转型,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,影响着各国和世界的前途命运,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焦点。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,历史没有给世界大家庭所有成员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。而随着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等级制国际分工体系瓦解,广大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凭借各自的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,不同程度地参与或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,在市场规律和开放政策的作用下,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,发达国家垄断全球化收益的能力相对减弱,利益格局出现新的变动。

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存在种种弊端,产生失衡问题,带来各种挑战,充满矛盾和竞争,应对不当更会加重不良后果,造成一体化与边缘化的巨大鸿沟。需要指出的是,我们看到的种种失衡、失序乃至危机状况,有些是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的,有些是应对全球化的方式和政策不当造成的。逆全球化、反一体化和保护主义、孤立主义风潮泛起,“退群”“废约”“脱钩”等举动,短期内可能造

成局部损害或停滞倒退,但改变不了经济全球化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等多领域、多层次继续推进的大趋势,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。

第二,社会层面。各国相互依存和全球共生系统生成,“地球村”效应日益扩大。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各国利益的交织融汇,数字经济更展现出非凡的联通效力,通过远程通讯、大众传媒、国际交易、投送系统和共享技术等,再加上大数据的计算能力,网络让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出现革命性变化,进而加快了社会和全球一体化整合步伐,经济全球化向各个领域渗透扩展。远的不说,瘟疫流行自古有之,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短短数月间能席卷全球,除极少数国家外,世界各国深陷其中,只要全球疫情未散,哪个国家也无法全身而退。这场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影响被空前放大,让国际社会每个成员都真切看到了世界互联互通的社会生态圈,看到了一损俱损、一荣俱荣的人类共生系统,看到了世界整体性发展和“地球村”的大致面貌,也显示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相互依存、利益交融、荣辱与共、密不可分的全球化时代。在全球化时代的“地球村”中,这样的场景随时可能再现,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畅想。

在一体化与边缘化并存的世界里,一面是工业化、现代化、科技化快速推进,人类文明高度物质化、数字化;另一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停滞落后,基本生活物资缺乏保障,脱贫、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仍是奢求,精神家园日益空虚,困扰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长期存在。人们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好处的同时,也对世界未来的前途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。

第三,政治层面。国际力量构成发生重大变化,世界格局真正具有全球意义。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,世界格局长期以欧美大国为中心和主角。进入21世纪,世界从单极独霸向多极化加速演变,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,世界格局向南北均衡方向发展。

与历史上的多极格局不同的是,当下演进中的世界格局真正具有全球意义。全球化打破了利益集中垄断的局面,大国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角,其构成及相互关系发生变化。大国成员增多、实力接近、利益交融、依存加深,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需求,以及对称和不对称军事力量的威慑作用,对大国间冲突对抗和战争形成有力制约,也促使各国更多从本国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出发,以更大的务实性与灵活性权衡和处理国际关系。同时,国际力量也更加多元,各种国际力量的组合形式灵活多样。地区组织联合自强,区域合作机制众多,自贸区安排大量涌现,“利益联盟”应运而生,旧式同盟趋于松散,国际机构、跨国企业、网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活跃,尤其是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力量和影响上升。国际舞台角色多样化、国际权力分配日益分散化、国际关系走向民主化的趋势不断深化;单一国家独霸世界、强权政治主宰世界、集团势力割裂世界、多数国家被排除在外的历史正在远去,世界和各国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。

我们既不能再按自然科学的概念来理解“极”,也不能仅按大国及其相互关

系来确定式样,更不能从极与极就是相互排斥与对抗的关系来认识。而要从多维多元意义上理解多极化,最重要的是看到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,以客观反映国际关系复杂变化的具体面貌和本质特征,避免掉入旧时代“大国均势”“大国制衡”等思维窠臼。

第四,安全层面。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,国际安全威胁重心转向普遍安全问题。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和普遍性,即便是原有的传统安全问题,也须用全球化的思维寻求解决之道。我们看到,历史遗留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仍然是最敏感的安全问题,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焦点话题或导致紧张冲突;全球和区域大国的地缘战略角逐仍在持续,各类矛盾引发的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不断;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的偏见挥之不去,集团对峙、军事结盟和冷战热战等旧时代的旧机制、旧观念顽固不化。

与此同时,世界各国乃至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产生,越来越成为各国和国际安全的核心问题。21世纪以来发生的几次世界性危机,无一不是非传统安全危机,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、人类公共卫生健康和国际经济金融安全,此外还有气候变化、网络安全、恐怖主义、自然灾害、跨国犯罪、人口激增和大量迁徙、外空等战略新疆域、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等挑战。通信技术革命、社交媒体发展、贫富差距拉大、环境日益恶化、瘟疫反复出现、战争毁灭性后果等让人们感到人类似乎已难以控制这个世界。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是国家间的相互安全威胁,而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。既涉及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,也与各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现实关联互动,还与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缠绕。在全球化时代,无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,都不能仅从安全 and 一国角度出发予以应对,而是需要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戮力同心,以公正合理、标本兼治的方式来加以应对和治理。而冷战思维、零和博弈、意识形态偏见、集团式对抗和军事同盟体系等旧安全观和旧安全机制,显然与国际安全现状和时代发展方向格格不入,严重干扰破坏着国际合作、特别是大国安全合作。如果不加以改变,只会使世界陷入乱象丛生、纷争四起的险恶境地,最终导致一损俱损的悲惨结局。

第五,制度层面。全球治理成为国际议程的焦点,助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。国际关系的历史见证了多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,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,从凡尔赛—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,依仗强权和霸权维持的国际秩序从来都无法造就长治久安。两次生灵涂炭的世界大战使人们认识到,广泛参与的多边机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本保障,联合国的成立构建起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。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,原有国际规则体系滞后于国际力量对比、国际安全性质和相互依存局面等时代变化,难以有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有效管理全球性事务。近些年来,应对全球性问题和人类共同挑战的迫切需求,促使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参与议题式全球治理及相关机制,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《巴黎协定》、防止核扩散的《伊核协定》等国际协定,催生出二十国集

团等新兴治理机制,推动了经济金融、公共卫生、网络安全、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全球和区域治理合作,原有多边机制和规则的缺陷多少有所改善。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,使多边主义秩序和治理体系更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全球意义,促使全球治理从强权掌控向广泛参与、全球共治的方向演进。

同时,推进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也受到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扰破坏。以实力获取本国优先权的政策宣示,以国家利益为名退出国际组织和国际契约的行为,以霸凌方式冲击国际体系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图谋,其基本逻辑是:只要退回到大国权力政治、国家中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过去,全球性问题就会自行解决。这不仅是认知上的严重谬误,更是将世界推到前进还是后退的十字路口。

第六,文化层面。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大思潮的交锋,成为影响世界未来走向的主导性话题。在不同文明文化、民族种族、宗教信仰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组成的国际社会,如何实现包容互鉴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。主义之争、制度之争、意识形态之争,导致国际社会的长期撕裂和集团对抗。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和全球治理需求的增多,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主题,全球化、全球治理、世界秩序成为重要辩题,如何应对和适应全球化的发展,更成为各国和国际社会探索的重点,随之产生了两种尖锐对立的社会政治思潮。

一种是在全球化引领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浪潮,这在一些国家的国际战略、内外政策和实践层面都有体现。在国际政治领域表现为权力政治、国家中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回潮,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强调民族国家至上、本国利益至上、国家实力至上的民粹主义、保护主义、反一体化、反自由贸易、排外主义等兴起,它们形成一种运动式的强势负面力量,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严重障碍。

另一种是全球化时代诞生的全球治理新理念、新实践。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全球性挑战,暴露出原有主导性制度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,引发各国政界和思想界的集体反思。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模式、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更适应全球化时代,更具有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?早在现代意识形态冲突出现前就产生的“治理”概念,以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的客观视角,考察和处理政府与社会、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,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。社会治理、国家治理、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理念在拓展,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陆续推出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国际上出现的“创建全球社会”“创立全球国际关系学”“管理全球公域”,以及种种国际新秩序主张不断出现,呼唤着、回应着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、秩序重塑和共同价值。这些新理念、新探索的基本前提和总体思路,是对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感悟,是对世界整体性发展和对“地球村”的关注,是对人类基本伦理和自然法则的坚守,是对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思考,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和制度竞争的狭隘眼界,是以世界主义情怀超越国家主义观念的追求。

这两种全球观和世界观的根本差异在于,在全球化时代,是笃信动物世界弱肉强食、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,还是寻求人类社会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共赢。这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核心问题,需要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,以人类共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,为世界整体和国际社会提供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、维持世界秩序所需的制度框架。

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发展中大国,能够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快速发展,根本原因之一,就在于认清了世界潮流,顺应了时代大势,抓住了发展机遇。四十多年前,当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时,中国毅然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和封闭状态,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,推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,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,充分利用两种资源、两个市场实现转型发展,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成为参与者和贡献者。四十多年后的今天,中国再次看到世界呈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透过变局乱局危局的表象,紧盯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大趋势,始终保持战略清醒、战略定力和战略前瞻。在纷乱复杂的国际环境中,坚持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,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,首先做好自己和自己的事情,顾及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感受,处理好与别国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。坚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,全面深化改革、扩大对外开放,把新时代改革开放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制度设计同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衔接起来,在与世界和本地区融合共生中实现发展。坚持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,寓中国崛起于国际体系、区域合作和新兴力量群体之中,在与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充分合作而非一争高下中,发挥力所能及的建设性作用。坚持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,遵守法治原则、主权平等、对话协商等国际关系准则,做和平友善、可亲可敬但不可欺的文明大国,最大限度地扩大朋友圈,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。坚持顺应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,虚心学习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,拥抱属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,尊重别国选择自身道路的权利,不搞意识形态输出与竞争,在与各国交流交往交融中实现繁荣进步。坚持顺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需要,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,遵循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,不谋求领导和主导,超越对抗性竞争,顾及彼此安全利益,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,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,携手推进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改革建设。

面向后疫情时期,中国对未来五至十五年的发展做出新的规划部署,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。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,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,愿意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,以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、要素资源共享、发展质量提升,为世界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,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的发展能量。

有人说中国的战略不透明、不清晰,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,中国的国家战

略规划是以科学判断形势、因应世界潮流为前提和依据的。认清了历史逻辑，把住了时代脉搏，也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国家战略的钥匙。尽管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并不宽松，对外关系中的矛盾和分歧长期存在，面临的风险、挑战和阻力重重，但是中国始终笃信“世界潮流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”的铁律，将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。新时代，中国更会以天下观天下、从世界看中国，秉持国际社会成员和世界公民的身份，以全球化时代的新视野，内外兼修，与世界各国一道，在开放中创造机遇，在发展中破解难题，在合作中应对挑战，充分融入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之中。